

# 汉字研究中“四体二用”说的确立及其应用

——读《戴东原集·答江慎修先生论小学书》

黄孝德

理论研究的突破，常常造成一代学术风气的转移。清代乾隆、嘉庆年间说文之学一反宋、元以来六书学的传统，异军突起，开创了一个引人注目的新局面。以段玉裁《说文解字注》、王筠《说文解字句读》、桂馥《说文解字义证》、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等为代表的四大家，在汉字研究中各具特色，成绩卓著，形成了著名的乾嘉学派。这一学派的形成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在理论上得力于戴震的“四体二用”说，则是共同的，不可否认的事实。学习前贤的著作，弄懂其传承的脉络，对当前字典编写和语言学史的研究都是必要的、有意义的。

戴震，字东原，清代著名的哲学家和语言学家，曾任四库全书纂修官，经部负责人。江永，字慎修，是戴震的老师。江、戴师徒之间交往密切。《戴东原集·答江慎修先生论小学书》(以下简称《论小学书》)是一篇重要的学术通讯，主要是讨论“六书”中的“转注”问题。汉字理论研究中著名的“四体二用”说，就是从这篇学术通讯中提出来的。

## 一 汉字理论研究中一篇纲领性的著作

在汉字的理论研究中，古文经学家曾经建立过巨大的功绩。他们把数量繁多的方块汉字用“六书”给以归纳，使之成为一个有规可循的科学体系。“六书”的提出是很早的事。据《周礼·保氏》记载，远在周朝，我们国家就曾设置学校，教授六门课程——“六艺”。“六书”是当时的“六艺”之一。但由于文献不足徵，这个时期“六书”的具体内容不十分清楚。

此后，人们对“六书”进行了不断研究，到两汉时期就有三种不同说法：

班固《汉书·艺文志》：“古者八岁入小学，故周官保氏掌养国子教之六书，谓象形、象事、象意、象声、转注、假借，造字之本也。”

《周礼·保氏》“五曰六书”郑众注：“六书，象形、会意、转注、处事、假借、谐声也。”

许慎《说文解字·叙》：“《周礼》八岁入小学，保氏教国子先以六书：一曰指事，指事者，视而可识，察而见义，上、下是也；二曰象形，象形者，画成其物，随体诂诂，日、月是也；三曰形声，形声者，以事为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四曰会意，会意者，比类合谊，以见指撝，武、信是也；五曰转注，转注者，建类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六曰假借，假借者，本无其字，依声托事，令、长是也。”

班固、郑众、许慎在汉代都是著名人物，然而，三家关于“六书”的名称和次序却不一致。汉学是讲究师承的，班固著《汉书·艺文志》，多抄自刘歆的《七略》。郑、许的说法，也可能来自刘歆，因为他们都是古文学派，可能都是从刘歆的著作中学到“六书”之说，再加上各自的发挥，才形成各自的定义和排列系统。三家之中，许慎最后，也是最有影响的一家。这是因为，许慎不但对“六书”下了比较确切的定义，而且举例说明，这就使“六书”的内容较为具

体了。许慎根据“六书”的理论，著《说文解字》，“分别部居，不相杂厕”<sup>①</sup>，创造性地将九千三百五十三字（不包括重文），按五百四十部首排列，既说文，又解字，这就使汉语字典从编排到释义都进入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说文解字》创稿于东汉和帝永元十三年（公元100年），至今仍被文字学家、训诂学家视为根底之作，原因正在于此。然而，要真正了解《说文》，亦非易事。因为有班、郑、许三家“六书”说，后来研究《说文》的人竟各持一端，任意发挥。特别是“转注”一门，分歧最大。戴震曾收集过自汉以来至清代各家有关“六书”的论述，“驳别得失，为《六书论》三卷。”<sup>②</sup>此书已佚，仅存其序，在《戴东原集》。我们根据这篇序言，参酌段玉裁著《戴东原先生年谱》中有关《六书论》三卷的叙述，还可以窥见这部著作与《论小学书》的密切关系。《六书论序》说：“今考经史所载，汉时之言六书也，说歧而三：一见《周礼》注引郑司农解；一见班孟坚《艺文志》；其一则叔重《说文解字·叙》颇能详言之。班、郑两家虽可以广异闻，而纲领之正宜从许氏。”《年谱》说：“先生以六书转注之为互训失其传二千年，言六书者讹谬日滋，为此书辨之。《六书论》者，论百家言六书者皆多谬说也。”《论小学书》是专论转注问题的单篇，戴震在《论小学书》中批评班、郑“所言各乖异失伦”，而对许慎却十分推崇，说：“《说文》于字体字训，罅漏不免，其论六书则不失师承。”由此可见，《论小学书》与《六书论》三卷的基本精神是一致的。“六书”是研究汉字的纲领，戴震自谓对这些问题已“存诸心十余载”，又长期收集材料，写过《六书论》三卷，所以《论小学书》可说是深思熟虑之作。这篇具有纲领性意义的著作，在汉字理论研究中影响深远，至今光耀不灭。凡是研究汉字的人，不读这篇著作是可惜的。

## 二 “四体二用”说的确立及其应用

《论小学书》之所以值得推崇，不在于它完全肯定许慎的“六书”说，而在于它在汉字研究中创造性地提出了“四体二用”说。

许慎“六书”说影响是很大的，但并非无可指责。许慎给转注、假借所下定义虽然确切，但所举例证却有歧义。加上《说文》一书又重在说文和解字，于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诸字的形体结构和造字本义说解甚详，而转注、假借两门限于体例未便多作说明。这就造成了一千多年来在这两个问题上聚讼纷纭，莫衷一是。假借，这里就不去说它。以转注而论，在戴震之前，大都认为是造字之法而不是用字之法。这种看法从班固开始，此后绵延不绝，生发出种种对于转注的解说。种种解说，又可分为两类：

一类着眼于“考老”两个例字的字形分析，来说明许慎所谓“转注”应如何理解。其影响较大者有下列各家。

唐代贾公彦撰《周礼义疏》，在“保氏”一节疏文中提出：“转注者，考老之类是也。建类一首，文意相受，左右相注，故曰转注。”贾公彦大概觉得，按许慎定义和所举例字难以说清这是一种造字法，于是就改许慎的“同意相受”为“文意相受”，强解“考老”两字形体为“左右相注”以就“文意相受”的定义。戴震批评裴务齐《切韵》：“考字左回，老字右转”<sup>③</sup>之说，大概由此而来。这是唐宋知名学者闹出的笑话。

到元代戴侗著《六书故》。周伯奇著《六书正讹》。他们都正确地指出了“考”是会意字，“老”是形声字，两字造字方法并不一样，主张改变转注的例字。但还是着眼于“考老”两字的字形，想改变例字来迁就定义。戴震说他们是“承用左回右转为转注，别举侧山为目，反人为匕等象形之变者当之。”

与“左回右转”为转注之说相近似的，还有戴震指出的：“徐铉、徐锴、郑樵之书，就考字博会，谓祖考之考，古铭识通用巧，于巧之本训转其义而加老省注明之。”也是泥于“考老”字形强解形体而就定义所产生的错误结论。

五代宋初徐铉、徐锴兄弟，都是《说文》的重臣。徐铉曾订正《说文解字》，新补十四字于正文，又以经传相承和时俗通用而为《说文》漏载者四百零二字附于正文之后，成大徐本。徐锴注意到了汉字形声相生、音义相转的规律，作《说文解字系传》四十卷，成就也很大。但他们都没有得到转注的真谛。徐锴说：“属类成字，而复于偏旁加训，博喻近譬，故为转注。人毛匕（音化）为老，寿耆耄亦老，故从老字注之。受意于老，转相传注，故谓之转注。义近于形声而有异焉。形声江河不同，滩泾各异。转注考老实同，妙好无隔，此其分也。”④又说：“故江河同从水，松柏皆作木，有此形也，然后谐其声以别之，故散言之则曰形声。江河可以同谓之水，水不可以同谓之江河。松柏可以同谓之木，木不可以同谓之松柏。故散言之曰形声，总言之曰转注……又寿耄耆耄可同谓之老，老亦可谓之耆，往来皆通，故曰转注，总而言之也。”⑤在徐锴看来形声造字法就包含着转注。形声与转注之不同，不在于形声是造字法，转注是用字法，而在于就一个个形声字讲，它是形声造字法，而就一群义符相同的形声字讲，他们之间所具有的共同的泛指概念可以互相注释，这就是转注。徐锴的错误是把形声与转注这两个不同质的问题，放在一个统一的大前提下，作了偷换概念的论证，当然只能得出似是而非的结论。

南宋郑樵撰《通志》，网罗各类知识合为一书，特别是其中二十略，颇具创见。但《通志·六书略》却问题很多。《通志·六书略序》说：“四曰转注，别声与义，故有建类主义，亦有建类主声，有互体别声，亦有互体别义。”也是拘泥于字形，想从形声字中分出转注字，不过比徐锴分得更细罢了。《通志·六书略》即据此而将形声字列入转注四类。分类既繁，义多穿凿，有些简直不知所云。所以戴震批评“徐铉、徐锴、郑樵之书……以谐声中声义两近者当转注，不特一类分为二类甚难，且较义之远近必多穿凿。”

这种“强以意解加之谐声字”的穿凿附会，到王安石作《字说》，陆佃作《埤雅》，以及程颐、朱熹等为了宣扬理学而说“中心为忠，如心为怨”等达到高峰，完全离开了六书规律而就字形任意发挥，使文字学进入了末途。因而被戴震斥之为“犹失六书本法，歧惑学者。”

还有如元代《六书统》、《六书溯源》的作者杨桓，提出：“转注者，象形、会意之文不足以备其文章言语变通之用，故必须二文、三文、四文转相为注释以成一字，使人绎之而自晓其所用之意，故谓之转注。”⑥更是把转注窄于形声之法。其实，形声字都是两文或两文以上的合体，难道都可以谓之转注吗？如果可以，那转注在“六书”中就没有存在的余地了，许慎为什么要把它列入“六书”呢？杨桓是无法解释这个矛盾的。“斯说之谬易见”，是用不着多做分析的。

另一类是着眼于字音来解释许慎的定义。他们把许慎为证明假借定义而举的“令长”两字，“乃移而属转注”，用来说明“转声为转注”之说。

宋代张有著《复古编》，根据《说文》，辨别文字正俗，以四声分列诸字，首倡“转声为转注”之说。张有说：“转注者，展转其声注释他字之用也，如其、无、少、长之类。”又说：“假借者，因其声，借其义。转注者，转其声，注其义。”⑦自张有“转声为转注”之说出，继之者众，然各有发挥。明代赵古则（筠谦）著《六书本义》、《声韵文字通》，提出：“转注者，转其声而注释为他字之用者也。有因其意义而转者，有但转其声而无意义者，有再转为三声用者，

有三转为四声用者，至于八九转者亦有之。其转之法则与造谐声相类。有转同声者，有转旁声者，有转正音者，有转旁音者。有惟取其书而转者。转注之别有五：曰因义转注者，如恶本善恶之恶，以有恶也则可恶（去声下同），故转为憎恶之恶；齐本一齐之齐，以其齐也，则如斋（与斋通，下同），故为斋庄之斋，此其类也。曰无义转注者，如荷乃莲荷之荷，而转为负荷之荷（去声）；雅乃鸟雅之雅，而转为风雅之雅，此其类也。曰因转而转者，如长本长短之长，长，因为物莫先焉，故转为长（上声）幼之长；长则有余，故又转为长（去声、下同）物之长；行本行止之行，行则有踪迹，故转为德行（去声、下同）之行；行则有次序，故又转为行（音抗）列之行，此其类也。”“或主意义，或无意义，然转声而无意义者多，学者引申触类而通其余可也。然自许叔重以来，以同意相受考老字为转注，依声托事令长字为假借。之说既兴，郑元以之解经、夹漈（郑樵）以之成略，遂失转注假借之本旨。”又说：“老字从人从毛从匕者，人之毛匕而白则老，会意字也；考者，老也，故从老省定意，从丂者，谐声字也。初非以老字转而考也。”⑩赵古则也认为许慎所举例字有矛盾，他的论述，触及到了汉字音义相转的规律，暗示了转注是用字之法，然其定义则是“转声为转注”，所举例字又与假借用法相混，所以，尽管他换了许慎的例字，也批评了郑玄注经与郑樵《通志·六书略》中的问题，但并没有在这基础上得出合乎实际的结论。

值得提出的是明代大学问家杨慎，他曾著《六书索隐》《答李仁夫人论转注书》。杨慎提出：“六书象形居一，象事居二，象意居三，象声居四。假借此四者也。转注此四者也。四象为经，假借转注为纬。四象有限，假借、转注无穷也。”⑪杨慎比赵古则进了一大步，他看到了“六书”中造字有限而用字无限这对矛盾，提出了“四经二纬”说，这是接近“六书”实际的，值得称道。但杨慎有一个错误，他认为“假借者，借义不借音；转注者，转音而注义。”这就把假借和转注两种用字方法颠倒过来了。他的理论，仍然可以看到“转声为转注”的痕迹。这是在戴震之前最接近戴震学说的一家。尽管在《论小学书》中没有提到“四经二纬”说，但戴震很可能是受了杨慎的影响才提出“四体二用”说的。

“转声为转注”之说影响是很大的，直到清代的大训诂学家顾炎武仍主其说。因此，戴震批评说：“虽好古如顾炎武，亦不复深省。”

戴震所处时代，古音学的研究正方兴未艾。尽管在戴震之前，吴棫已创四声互用之条。陈第《毛诗古音考》又提出了“时有古今，地有南北，字有更革，音有转移”的历史观点，并论述了古无四声的道理。江永著《古韵标准》，戴震曾参与其事。在江、戴的著作中解决了入声兼配阴阳的问题。其他问题也尚未深究。在戴震之后，江有诰、王念孙等提出了“古四声与今不同”说。段玉裁提出了“古无去声”说。直到黄侃才提出“古祇平入两声”说。上古汉语中的调类、调值问题，至今不得确论。戴震必竟是一位严肃的学者，他认为“在古今音读莫考”的情况下，强把转声作为转注的理论根据，是不妥当的。戴震写道：“如好恶之恶，今读去声。古人有读入声者。美恶之恶，今人读入声，古人有读去声者……窃意未有四声反切之前，安知不为一音乎？据此言之，转声已不易定，转注、假借何以辨？”戴震这种从实际出发的朴学精神是值得称道的。

文字研究，不外形、音、义三者，只有将三者结合起来，并从各自研究的对象中寻找它本身的矛盾，才能解决各自的课题。一千多年来关于“转注”问题的争论，无论是“左回右转为转注”或“转声为转注”，之所以得不出科学的结论，就是脱离了语言的实际，没有从字义历史发展的角度去研究“转注”。在清代，江慎修是一位有成就的语言学家，他是第一个悟出了要

从本义、引申义、假借义这个全面解释词义的角度来考虑转注、假借问题的人。他在给戴震的信中提出：“本义外展转引申为他义，或变音或不变音皆为转注；其无义而但借其音或相似之音则为假借。”这就是说，转注是本义的引申，假借则是同音或相似之音的替代。江慎修完全摆脱了“左回右转为转注”、“转声为转注”这类陈腐学说的桎梏，是文字学史上应当记上一笔的大事。在江慎修之前，还没有谁明确地提出过这个问题。然而，江慎修尽管悟出了转注是本义的引申，假借则是同音或相似之音的替代，他却在文字训释中碰到了“字之本义亦有不可晓者”这个棘手的问题。这是因为，在汉语中有些多义单音字的字义，由于历史发展的线索被打乱，常常枝蔓横生，本义难以确定。这又和假借字有关。常常是一个字被借作他用，有时久借不归，本义被人遗忘，而假借之后，又引申出新的字义。江慎修碰到了这种转注与假借的交叉关系，提出来和戴震讨论。戴震说：“震之疑不在本义之不可晓，而在展转引申为他义有远有近，有似远义实相因，有近而义不相因，有绝不相涉而旁推曲取又可强言其义。”字义引申的过程是复杂的，碰到这种复杂情况，关键在于确立转注与假借的界说，破除“左回右转为转注”、“转声为转注”这两种谬说所造成的，把形声、假借混作转注。尽管形声、假借与转注都有关系，但各自的性质和作用是不同的。戴震说：“区分假借一类而两之，殆无异区分谐声一类而两之也。六书之谐声、假借，并出于声也。谐声以类附声而更成字，假借依声托事不更制字。或同声或转声，或声义相依而俱近，或声近而义绝远，谐声具是数者，假借亦具是数者。后世求转注之说不得，并破坏谐声、假借，此震之所惑也。”谐声是造字之法、假借是用字之法，这两种都是明确的，不能从这两类中去求转注，只有从整个六书的系统上考虑转注，才能得到转注的真意。戴震是相信许慎六书说必有师承的，他是不可能乱下定义、乱举例字的。戴震说：“考老二字属谐声、会意者，字之体，引之言转注者，字之用。”所谓转注，就是“古人以其语言立为名类，通以今人语言，犹云互训云尔。转相为注，互相为训，古今语也。”戴震认为，字书中的转注，犹如训诂中的互训，《说文》的转注用字法，早在《说文》之前的《尔雅》中就已普遍使用。转注是讲字义的互相训释。时有古今，地有南北，字有更革，音有转移，有了转注，则“别俗异言、古雅殊语，转注而可知，故曰建类一首，同意相受。”

《尔雅》中的互训全是转注用字法吗？戴震之后的朱骏声作《说文通训定声》时，对此提出了异议。朱骏声检查了《尔雅》中数字共一义的互训，发现其中混进了一些假借用字法。在这一点上，朱骏声比戴震精密。尽管如此，戴震明确断定《说文》中的转注，犹如训诂中的互训，这个意义还是很大的。它加深了我们对《说文》的理解。使我们懂得，许慎著《说文》，不光是说文和解字（即研究文字结构及其本义），而且也注意到了文字在使用过程中的互相训释。这在词典学中，和研究文字本义一样，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在现代词典学中，有所谓语词式释义方式。“转相为注，互相为训”，就是语词式释义中的同义词或近义词的释义。戴震明确断定转注犹如互训，可谓得到许说的精义。

《答江慎修先生论小学书》从解决“转注”问题入手，通观整个“六书”系统，提出了“四体二用”说。戴震写道：“大致造字之始，无所凭依。宇宙间事与形两大端而已，指其事实曰指事，一二上下是也，象其形之大体曰象形，日月水火是也。文字既立，则声寄于字，而字有可调之声，意寄于字，而字有可通之意，是又文字之两大端也。因而博衍之取乎声谐曰谐声，声不谐而会合其意曰会意。四者，字之体止此矣。由是之于用，数字共一用者，如初、哉、首、基之皆为始，卯、吾、台、予之皆为我，其义转相为注曰转注；一字具数用者，依于义以引申，依于声而旁寄，假此以施于彼者曰假借。所以用文字者，斯其两大端也。”戴震“四体二

用”说一出，使文字理论研究中一个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得到了解决。据说：“江先生得其书，谓众说纷纭，得此论定，诚无以易”（见《戴东原先生年谱》）。可见，江慎修是赞成这一创见的。

戴震的“四体二用”说，划清了造字方法与用字方法的界限，使研究文字的本义与引申义之间的关系有了明确的界说，其影响是巨大的。清代《说文》四大家段玉裁、桂馥、王筠、朱骏声正是在这面理论旗帜下集合拢来，在乾嘉年间兴起《说文》之学的巨澜，被誉为乾嘉诸老。清代训诂学家王念孙、王引之父子，在训诂学上振兴汉学，努力研究文字的本义、引申义、假借义，他们在字义训释、通假界说上比前辈训诂学家进了一大步，因而业绩辉煌，也受益于戴震的“四体二用”说。《说文解字·叙》段玉裁注：“六书者，文字声音义理之总汇也。有指事、象形、形声、会意，而字形尽于此矣。字各有音，而声音尽于此矣。有转注、假借，而字义尽于此矣。异字同义曰转注，异义同字曰假借。有转注而百字可一义也；有假借而一字可数义也。字形、字音之书，若太史籀著大篆十五篇，殆其一端乎。字义之书，若《尔雅》其最著者也。赵宋以后言六书者，胸襟狭隘而不知转注、假借所以包括训诂之全，谓六书为仓颉造字六法，说转注多不通。戴先生曰：指事、象形、形声、会意四者，字之体；假借、转注二者，字之用也。圣人复起，不易斯言。”段玉裁完全同意“四体二用”说，并持此以注《说文》。《说文解字段玉裁注》，是乾嘉年间《说文》之学复兴的标志，他大量引用经典文字来注说文，寓“作”于“述”，注意分清造字本义与用字的转注义、假借义之间的发展变化，被王念孙誉为“盖千七百年以来无此作矣。”<sup>⑩</sup>段玉裁在文字研究上的成就，其理论上就是得力于“四体二用”说。桂馥著《说文解字义证》，述而不作，大量搜寻例证，“敷衍许说，发挥旁通，令学者引申贯注，自得其义之所归。”<sup>⑪</sup>王筠著《文学蒙求》，存象形、指事、会意、形声四卷，而根本不提转注、假借。都从另一个方面反映了“四体二用”说在字说上的具体应用，说明《通志·六书略》式的字说系统，已被“四体二用”说取代了。

### 三 两个值得商榷的问题

当然，我们肯定《答江慎修先生论小学书》在文字语言学史上的贡献，并不是说其中所提到的问题全是对的。戴震在提出“四体二用”说时，附带提到两个问题，值得商榷。

首先，是“六书”次序问题。许慎把指事置于象形之先，又将形声置于会意之前，并不符合汉字产生、发展过程中，由具体到抽象、由简单到复杂这一规律。在这个问题上，班固“六书”说是可取的。然而，戴震却是许而非班，尚欠周密。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用不着多说。

其次，戴震提出转注即互训，和江慎修提出的转注是本义的引申，这两个命题并不矛盾。江慎修是从字义发展的历史顺序来讲转注；戴震是从字与字之间互相训释来讲转注。两者本可以互相补充，把转注讲得更加清楚。然而，戴震过分相信许慎的定义及其所举例字，从而提出“数字共一用者，其义转相为注曰转注；一字具数用者，依于义以引申，依于声而旁寄，假此以施于彼者曰假借。”这就将文字的引申义也算作假借，是不妥当的。在戴震之后，段玉裁照搬此说，所以在段注中常常把引申义当假借看待，这是在读段注时需要注意的一个问题。清代嘉庆年间洪亮吉著《六书转注录》十卷，把《尔雅》、《说文》、《释名》、《广雅》、《小尔雅》中的互训分篇类纂在一起。后又以此为基础，依《尔雅》释诂、释训、释言的体例，属辞比事，将经传遗言和老、庄、管、荀、史、汉等著作中的材料汇集在一起，写成《比雅》一书，也是以戴震的转注说为理论基础的。洪亮吉把转注处理得更宽，竟至把假借都包容进去了。这也

## “飞石”

——读鲁迅著作日记之二

鲁 牛

《故事新编·理水》中有一个乡民出去捞水草，有官船来了，他因为躲避得慢，吃了一下官兵的飞石。头上肿起一块乌青的疙瘩。这飞石，原是一种原始的战具，《汉书·甘延寿传》：“投石拔距绝于等伦”。这种筒略战具，外国也有。雨果在《晨星》一诗中有这样的诗句：“我是充当前驱的星辰，我是种籽，人们以为它已死亡，然而它又再生。……我是火

红的金质的石子，上帝曾用投石带将它抛出去射击黑夜昏暗的前额。”紧接着写道：“起来吧，道德，勇气，信心！思想家们，到城楼上去吧，充当哨兵！”不过两者目标不同。雨果的诗是把晨星比作上帝用抛石带打出去的火红色的金质的击向黑夜昏暗的前额的光辉的石子。而《理水》中腐败官僚则是指使他们的鹰犬用来驱赶、镇压老百姓的用具。

可见戴震转注、假借说不够周密的流弊。在清代，只有朱骏声看出了这个问题。朱骏声作《说文通训定声》，提出：“凡一义之贯注，因其可通而通之为转注；一声之近似，非其所有而有之为假借。就本字本训而因以展转引申为它训者曰转注；无展转引申而别有本字本训可指明者曰假借。转注无它字即在本字，故转注居假借之前；假借无本字而偶用别字，故假借附六书之末。”<sup>⑩</sup>基于这样的认识，朱骏声大刀阔斧地修改了许慎关于转注、假借的定义，重举新的例字。朱骏声的转注、假借说，与江慎修的说法十分近似。朱骏声非常聪明，他继承了戴震的“四体二用”说，同时，又肯定了江慎修的成就，排除了戴震把引申义当假借义的错误。朱骏声作《说文通训定声》，做了三件有意义的工作：一是“说文”，讲文字结构和造字本义；二是“通训”，讲用字的转注义和假借义；三是“定声”，按古韵十八部（杂用段玉裁和王念孙古韵分部）将《说文》九千多字按音系排列，以“著文字声音之原”。朱骏声把文字形、音、义三者结合起来，以“说文”作为字义转注的基础，以“定声”作为假借的条件，从而把字义按历史发展的线索归纳成本义、引申义、假借义这样一个完整的系统，开了汉字研究的新局面。尽管《说文通训定声》还有其他一些问题，但这个字义系统，从今天字典的高度看，也还是科学的、值得肯定的。在这个方面，朱骏声的成就，又远在江慎修、戴震之上。

注释：

- ① 许慎《说文解字·叙》。
- ② 《戴东原集卷三·六书论序》。
- ③ 裴务齐曾为《切韵》增字。此文引自《洪武正韵卷三·十三巧》“考”字注引。
- ④ 《说文系传》卷三十九卷首。
- ⑤ 《说文系传》卷一“上”字注。
- ⑥⑦ 均引自胡楹玉：《六书浅说》。
- ⑧ 赵抃：《转注论》（见四库全书卷二百十七·六艺之一录）。
- ⑨ 又顾炎武《音论卷下·六书转注之解》亦曾引用此文。
- ⑩ 《说文解字段玉裁注·王念孙序》。
- ⑪ 桂馥：《说文解字义证·张之洞序》。
- ⑫ 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卷首。